

以无畏探求未知

——评牛汝极教授新作《十字莲花》

洪勇明

(新疆大学 语言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8)

唐、元两代曾在华夏大地风行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我国称景教),由于存在政治依附性、教徒外来性、教义本土化等原因,最终消失。研究景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至会昌五年(845)、有元一代的兴衰,对研究基督教在华发展历史及其在中亚、远东的早期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景教的神职人员多为中亚粟特人或回鹘人,故而留下的汉文教义非常少。仅有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序听谜诗所经》、《一神论》、《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志玄安乐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大秦景教大圣遍真法赞》等。这些教义文字艰涩难懂,并夹杂佛、道两教的内容,因此很难为研究者直接利用。

所幸元代蒙古汪古、克烈、乃蛮等部以及回鹘人因长期笃信景教,也留下为数众多的碑铭。这些以叙利亚文、回鹘文、八斯巴蒙文写就的铭文,对研究汉文景教教义是有益的补充。同时,这些石刻也是研究元代景教传播路线和发展特点的直接依据。由于我国乃至世界,通晓古叙利亚文和回鹘文的学者并不多(至多数十人),有关铭文的解读工作进展缓慢,因此学界未能有效利用这些石刻文献。

令人欣喜的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十字莲花》一书,为我国宗教学界、民族学界充分利用这些弥足珍贵的碑铭文献提供了一把钥匙。本书作者是阿尔泰学国际知名学者、我国维吾尔学的中流砥柱、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牛汝极教授。但凡翻阅这本装帧精美、印刷精致的学术书籍的读者,无不为其数十年如一日的探索精神所折服。

本书是牛汝极教授在其法国高等研究试验学

院(EPHE)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之所以能通过世界一流的突厥学研究机构的认可,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笔者自知才疏学浅,无法窥识牛著的博大精深,只能略识皮毛,作一不知深浅的介绍。

该书分为前言、正文、附录三个部分。前言包括对景教和中国景教及其信徒墓碑的通识介绍、叙利亚文突厥语音系统描述;附录包括作者所译 Mingana 的《基督教在中亚和远东的早期传播》、Sims-Williams 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记突厥和粟特基督徒》、Klimkeit 的《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艺术》;作者所著《泉州的景教碑铭文献》、与 Harrak 合著《伊拉克 Mār Behnam 陵墓的回鹘文铭文》。此外,附录部分还包括中日文参考文献、西文参考文献。正文部分共七章,分别是:第一章 中国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的发现和研究的发现、第二章 敦煌发现的两件叙利亚文景教写本残片、第三章 新疆阿力麻里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徒碑铭、第四章 内蒙古百灵庙和王墓梁叙利亚文碑铭、第五章 呼和浩特白塔和赤峰发现的景教徒铭文、第六章 扬州发现的叙利亚文和拉丁文碑铭、第七章 泉州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

通读全书,笔者深感本书的特点可以概括——立意新颖、条理清晰、结论严谨、材料充分、内容广泛、言简意赅。具体介绍如下:

一、坚持以碑铭解读、注释为主的方向

大约在6世纪时,起源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就传入新疆。最迟在781年,景教就已经在中原地区流行。会昌法难之后,景教在内地灭绝,景教徒纷纷迁居中亚,并在漠北蒙古地区继续传教,继而流行于克烈、乃蛮、汪古等诸部。

收稿日期:2010-06-10

作者简介:洪勇明(1971—),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大学语言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古代突厥-回鹘和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

蒙古兴起并发动西征以后,大批被俘或裹胁的中亚、西亚、东欧的基督教徒随蒙古军队东来,进而南下进入内地。由于崇信景教的蒙古人(部分)和色目人被元室特定为“上等民族”,政治和法律地位最高或较高,因此,他们有机会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传教。同时,这也使得他们的墓碑遍布从阿力麻里直到泉州这一广阔区域内。

对于这些极具宗教研究价值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不同的学者往往有着不同的研究目标。比如: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榎一雄对敖伦苏木古城出土的叙利亚文墓石的研究,就属于考古学报道。牛汝极教授是语言学家,专治回鹘文,因此他将文献的模拟、标音、转写和注释作为重点。在注释中,牛汝极教授特别注重对专有名词、景教碑铭固定格式以及回鹘语语言结构的解释。这一做法,实际是为其他学人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同时,也为研究元代回鹘文提供宝贵的语料。以第七章《泉州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为例,在对“叙利亚文铭文1”的注释中,牛汝极教授就提到三个专有名词:qochu(地名—高昌)、turymiş ata är(人名—图克迷西·阿塔·艾尔)、zaytun(泉州古称—刺桐);一个景教碑文常用语:tängri yarlıqı bütürdi(完成了上帝的使命);一个回鹘文惯用结构:özüti+utmaq-ta bolzun/bolur连用,意为“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对于研究宗教传播和民族流动的学者而言,高昌人图克迷西·阿塔·艾尔之子乌斯提克·塔斯汗何以来到刺桐城、其在景教中的地位、元代高昌在景教传播中的作用、内迁回鹘人的分布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坚持总一分一补、由外及内的结构框架

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景教碑铭研究的主要著作有:佐伯好朗的《景教之研究》和《中国之景教》、朱谦之的《中国景教》、江文汉的《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罗香林的《唐元二代之景教》、穆尔的《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林悟殊的《唐代景教再研究》、翁绍军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等。这些专著就体系而言,多为宏观粗放式,即:直接采纳经过解读的文献,进而讨论文献的宗教学和历史学意义。以中国景教研究泰斗佐伯好朗(Yoshiro Saeki)的《中国景教文献和遗物》(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37)为例,该书对内蒙古百灵庙附近发现的景教墓石的研究,就属于对原始文献的概览式研究。当然,这也与佐伯好朗是宗教与法律学者,而非语言学者有关。

牛汝极教授作为一位著名的语言学者,曾历经10年的语言专业培养,近30年的语言教学研究,因此对文献研究的体系构思是相当娴熟的。该书在体

例安排上,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学著作,而是采纳文献研究的模式。在正文之前,他首先归纳出用叙利亚文拼写突厥—回鹘语的规则,并列出行音和辅音字母表。字母表包括:叙利亚文字母、字母名称、字母标音、回鹘文转写。其次是介绍我国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的发现经过和研究概况,为正文的展开做铺垫。再次就是具体碑铭的逐一解读,即:碑铭研究概述—原文模拟—标音—转写—注释。最后的附录部分则是对正文内容的有力补充,既包含景教的早期传播史和教徒史,又包括景教的碑铭解读和艺术分析。以牛汝极教授的《Nestorian Grave Inscriptions from Quanzhou》为例:作者在介绍石碑的类型时指出:泉州发掘出的墓碑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祭坛式,一是简单式。景教徒的祭坛式墓碑,其中央部分饰以十字架和天使,两侧镌刻有景教叙利亚文铭文。景教徒的简单式墓碑,通常分为五层,顶层刻有十字架和莲花。

在对文献的研究上,牛汝极教授主要是从语言材料分析着手,进而探究语言形式底下所隐含的意义。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兰克(Ranke L.V)建立的语言历史学,即以语言文字为重要工具,从语言文字入手,运用语言文字来阐释历史的学科。这种由外及内、由表层到内部的写作体系,使得该书的学术价值得到极大的彰显。以其对泉州发现的回鹘文铭文研究为例:他认为其中的man就是“满”,进而认为这是“建除满”纪年体系在回鹘人中传播的见证。这一观点其实在冯·佳班(A.v.Gabain)的《古代突厥语语法》中也可以印证。如:kinchuman(建除满)、tutmaq(持)、tī(定)、siu(收)、qay(开)、pa(破)、pi(平)、piy(闭)、kuu(危)、kin(建)、chī(执)、äzi(成?)

三、坚持科学分析、审慎定论的逻辑思维

自从俄国学者赫沃利索恩(D.A.Chwolson)校录的《七河流域叙利亚文景教墓志铭新录》(Syrisch-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Semirjetschie: Neue Folge, St.Petersburg, 1897)问世以来,学界对于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的研究就从未止步。比如早在1907年,俄国学者科科夫措夫(P.Kokowzoff)就在《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会论丛》第十六卷上发表《阿力麻里出土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墓碑铭文考释》,对阿力麻里古城碑石进行研究。前人取得的成就是后学进步的基础,不容抹杀。但是美中不足,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一些学者的成果也出现一些特定时期内无法避免的瑕疵。

牛汝极教授在前辈学者和当今学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秉承科学务实的态度,在深入实地拍摄、拓片之后,作出较为准确的结论。之所以能够作出

合理定论,这与牛汝极教授的勤奋踏实、博览群书、广泛合作是分不开的。尊重他人的研究心血,但不迷信;修正他人的研究偏误,但不尖锐,是牛汝极教授的一贯学风。对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折子式双折写本,段晴、张铁山曾对第1面的叙利亚语、回鹘语进行研究。牛汝极教授在肯定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指出存在的问题。比如对段晴的第一栏正面第8行 sftw' 的转写,牛汝极教授谨慎地认为:段晴认为其中的 f 经过了抄写者的涂改,但是,叙利亚文一般通行的字母表中并没有 f 音,而是 p 字母 P。我个人认为,这个字母并未经过涂改,而是抄写者写这个字母时所蘸的墨较重所致,别处也没有发现涂改的痕迹。

再以扬州景教墓碑主人的丈夫忻都及其族属为例,牛汝极教授在遍查姚景安编《元史人名索引》所列12个忻都基础上认为:此忻都有一定的名望,我们不同意王勤金先生认为忻都是“普通的蒙古人而非显贵”的看法。同时,他还根据哈斯额尔敦教授和道布研究员的意见,参照元代回鹘语的特点,进而认为忻都属于畏吾儿的可能性最大。对于耿世民教授、Klimkeit、Laut、Franke 先生依据黄溥的《金华黄先生文集》认定忻都是哈喇鲁部答失蛮次子,曾任职扬州的观点,牛汝极教授并没有盲目随从。他有保留地认为,此忻都可能就是《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中所提到的那位生于至元九年,卒于至顺二年的忻都。

四、坚持有理有据、重视资料搜集的学风

在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中国人出材料,外国人出理论”的怪现象。近来在不良学术风气的驱使下,“不出材料出理论”在我国一些所谓“学者”中蔓延。还有部分人在“打擦边球”,明明是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直接翻译过来不加引用注释,居然变成自己的成果,甚至自诩为“突厥学者”、“三夷教研究专家”、“中外关系史学家”。不去实地调查,不去引经据典,却去做“摘桃子”的猴子,这种行径实为学界所诟。

牛汝极教授为人谦虚诚恳,工作兢兢业业,完全继承老一代学人的考证传统。纵观全书,无论是图片还是文献,都是异常丰富。全书共有图版123幅,其中多数为作者所拍摄。一些业已佚失的碑铭,他则千方百计找到已发表的图版。一些无法拍照的碑铭,他就绘制图版,以供其他学者研究之用。全书共列中日文参考文献近300条、西文文献近500条、缩略语33条。这些图版的收集,几乎长达10年之久。为此,作者的足迹遍布从阿力麻里到泉州、从百灵庙到扬州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凡是有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的地方,都留下了牛汝极教授的身影。由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国家学者对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的释读和研究有较深的造诣,因此牛汝极教授不仅远渡重洋去欧洲求学,而且和国际一流学者合作刊布叙利亚文景教文献。正是这一系列的努力,使得该著作“既是一本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专著,也是一部资料汇编。本书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成果,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几代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收获”(徐文堪语)。

以第五章《呼和浩特白塔和赤峰发现的景教徒铭文》为例,在对仅存八行的墓砖铭文解读中,牛汝极教授竟然参考了近二十条中外文文献。其中既包括突厥学家冯·佳班(A von Gabain)的著作《古代突厥语法》(Alttürkische Grammatik),也包括景教研究成果彼得·茨默(Peter Zieme)的《回鹘景教徒的婚礼》(Ein Hochzeitsessen uigurischer Christen)。实际上,这些参考文献就是学者们进行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研究的指南。

五、坚持与时俱进、融会贯通的研究理念

早在商代就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名言,孔老夫子非常赞赏这句话,他说:“日新之谓盛德”,意思是说,如果能够做到天天都创新,那是最高的道德。同样,社会科学研究也应当与时代同步、与当今社会发展水平同步。一味墨守陈规,只是思想僵化、意识保守的表现,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朱熹在《朱子全书·学三》说:“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融会贯通,看似治学方法,实质为研究观念,即:立足于某一领域,放眼于其他学科。这种研究理念,源于学者的知识积累和敏锐的观察感知能力。为此,朱自清在《中国学术的大损失》中提到:“要没有活泼的想象力,就只能做出点滴的琐碎的工作,决不能融会贯通的。”

牛汝极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自主培养的第一批突厥学研究者之一,也是较早走出国门,去突厥学的发源地——欧洲进行系统学习的留学生之一。在这一教育背景下,牛汝极教授的视野更加宽广、观念更加国际。客观地说,《十字莲花》一书代表着我国学者对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研究的最新、最高水平。“《十字莲花》将国内遗存的、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元代景教叙利亚文碑铭转写、翻译,使之成为便于突厥语学界和一般历史学研究都可以参考使用的基本资料的结集,填补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关基础研究的空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徐文堪语)

以曾受高山杉批评的“旧译弃用”为例,牛汝极

教授之所以这样翻译,绝非“割断历史的血脉”(高山杉语),而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国际学术的规范。如他将 giwārgis 译作乔治,而非蒙元时代汉文史料中的“阔里吉思”。史有为在《汉语外来词》中提出:人名、地名的输入原则应当是“名从主人、兼顾客人”。现代汉语词汇中,双音节词语占优势,因此译作“乔治”更符合中国人的语言心理。此外,“阔里吉思”这一旧译,也无法体现时代特点。这与用法兰绒、威士忌、尼龙、布丁代替佛兰绒、灰司克、呢隆、布竹如出一辙,是符合现代人语用习惯的。当然,对于一些学者在几十年前所作的翻译,牛汝极教授也提出若干新译。姑且不管谁对谁错,单就这一做法,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读者自然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牛汝极教授在第六章《扬州发现的叙利亚文和拉丁文碑铭》中,对 DOMONICI DE ILIONIS 的翻译,就与夏鼐、Lopez 的看法有所不同。前者将 DOMONICI DE 译做家族名称的一部分,后者则译为“维利尼翁的”。显然,两者对拉丁文中的 DE 的看法意见相左。

牛汝极教授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因此《十字莲花》一书也是其融会贯通理念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不单单是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的解读,更是一部关于中国元代景教的百科全书。全书不仅论及元代景教的传播,还涉及到景教艺术、景教体字母记录的中世纪叙利亚语和回鹘语、景教徒墓碑的考古等。此外,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亚民族和中原王朝的交往,本书也有论述。

六、坚持有一说一、行云流畅的写作风格

北齐颜之推曾说:“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驎,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这是要求在写作中扣紧题意,围绕中心,既放得开,又收得拢,不要“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薛应旗在《薛方山纪述》亦认为:“古者以行为言,故其文简而中;后人以言为行,故其文烦而忆。”今译为:古时候的人用行动代表言语,所以古人写出来的文章简捷明了而又实在中肯;后如今的人以言谈充当行动,所以今人撰写出来的文章繁杂琐碎而又扑朔迷离。正因为如此,当今某些学术著作动辄百万字、天马行空,但实质内容居然不足半。《十字莲花》一书虽然仅有 30 万字,但都是围绕叙利亚文景教碑铭展开的,就事论事,基本没有赘言。

以第三章《内蒙古百灵庙和王墓梁叙利亚文景教碑铭》墓碑 2 为例:该碑共有叙利亚文 12 行,牛汝极教授只用 700 余字就完成了释读。惜墨如金,字字珠玑即可略见一斑。叙述中详略得当、主次分明则体现牛汝极教授对材料烂熟于心,取舍裁剪挥

洒自如。比如关于汉语-叙利亚语双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论述,可资参考的资料非常丰富。几乎所有涉及早期基督教传播或基督教徒史研究的书籍对此都有所论及。但因该碑系唐代德宗建中二年(781)所立,故牛汝极教授说:关于此碑的发现和已有较长的历史,并已取得丰厚的学术成果,可资参考的文献极多,这里不再赘述。

行云流畅、深入浅出一直是牛汝极教授最突出的写作风格。很长时间以来,一些纯学术书籍在付诸印刷后,立即就被出版社束之高阁,其主要原因就是语句晦涩绕口、理论曲高和寡。《十字莲花》虽然也属纯粹的学术论著,但却是最贴近社会、最贴近读者的雅俗共赏之作。牛汝极教授在前言中提到:这批碑铭文物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其进行抢救、整理并尽快研究,不仅对学科建设和文物保护有积极促进作用,对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也有现实意义。在“教学、科研要服务社会”这一理念的感召下,本书已经实现了牛汝极教授的研究主旨,并在普及景教知识方面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1 世纪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牛汝极教授将满腔的爱国热情灌注在《十字莲花》一书中。在本书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中青年知识分子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气息,而且还能看见海外归国学者对祖国母亲的拳拳报国之心。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曾说:尽可能少犯错误,这是人的准则;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梦想。尘世上的一切都是免不了错误的。错误犹如一种地心吸力。本书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小的纰漏,如:个别词语前后不太统一、一些数据测量不够精确、未附词汇和专名索引等。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些失误相比本书成就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写毕,笔者愿摘录一首小诗献给牛汝极教授,并与其他读者共勉:“求知需要勇气,任海浪呼啸,求知者无所畏惧。求知需要坚韧,任山崖陡峭,任沟壑幽深,求知者决不退缩。求知需要信心,任驼道漫漫,求知者心有绿洲。”

作者后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高山杉的《牛汝极〈十字莲花〉的“硬伤”》(《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版 2009-03-01,网址 <http://www.dfdaily.com>)和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徐文堪的《也谈〈十字莲花〉》(《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版 2009-03-15,网址 <http://www.dfdaily.com>)是两篇观点迥异的评论文章,读者可以参考。

【责任编辑:张建国】